

玩物何至于丧志

杨扬

恋收集各种瓷器小件和民间绣品。1950年代后，转向碑拓照片。但施先生留存世间的遗物中，似乎没听人谈及他的旧瓷与绣品，倒是他收藏的拓片，据说打包拍卖，为一些民间藏家所获。而晚年的沈从文先生有专门的研究瓷器的文章，如《谈瓷器艺术》和《中国古代陶瓷》，收入他的考古论文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1949年后沈从文先生彻底转向考古，瓷器或许是他选择的第一个研究方向。他不仅将家里的古瓷捐赠给北大的陈列室，还给北大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讲解瓷器。沈从文先生对中国瓷器的印象是“各极其妙，美不胜收。”那种欢喜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或许在那个大难临头，精神极度困惑的时刻，沈从文先生只有从瓷器这类玩物中，还可以寻找到一点安慰和精神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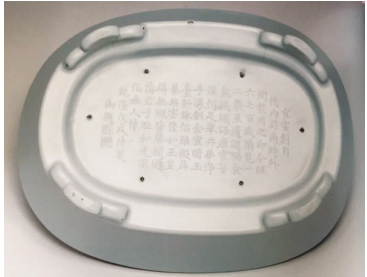
瓷器之类物件，是可以游心怡神的对象，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它们。但这类收集与今天的所谓收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常常听到一些人在问，好东西收了不少吧？还有干脆说，增值了吧？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除了与鉴宝有关之外，与赏玩其实没有丝毫的关系。鉴宝的要点在于聚宝发财，而赏玩的意义在于欣赏和愉悦。读者所熟悉的施蛰存、沈从文先生，名家字画和古瓷佳品也有收集，但并不见他们因为收有古瓷或一些所谓的古董而变得大富大贵，相反，他们的生活始终如一，与富贵沾不到一点边，真所谓富贵于我如浮云。他们沉湎的是那个精彩绝伦的审美世界，寻求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生乐趣。如果没有这种乐趣的支撑，或许他们的艺术生命早就走到了尽头。所以，赏玩与其说是玩物，毋宁说是赏玩者自己的人格志趣的内在激励和无限寄托。读书人要守得住寂寞，但这寂寞不是枯寂无聊的生活，而是拥有赏玩在内的诸多丰富的生命体验。郑之诚先生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是现代文化人中收藏较丰的一位，生前著有《古董琐记》。在他身后出版的日记中，常可见他代人鉴定字画古书，或托人买卖古董的事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古董的珍爱，以及抗战时为解解生之急需，出售自己的心爱之物等内容。如，1934年12月4日，佣人打碎他的宋官窑盘口纸搥瓶，让他惋惜不已。1944年3月25日，清理出玉器和旧瓷十多件，托人代售，以接济家用。1948年4月5日，陆志韦来访，谈瓷。次日，有朋友请他欣赏汝窑八卦小瓶。这些来来往往有关古董瓷器的记录中，有时也涉及买卖和钱财的问题，但通观所有的日记文字，你不由得对郑之诚先生这一辈读书人表示钦佩。他们玩物，但不被物所泥，手中经过的宝物无数，但从来没有穷凶极恶的贪欲。赏玩，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读书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滋养他们个人学养和精神气质的文化来源。

朱光潜先生在1930年代撰写的散文《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中，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看书写作，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后门大街去走走看看，因为那里有十几家古玩店和几家旧书铺，时常可以淘到一些瓷器、古书，那些东西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但到手时的高兴却是他所追求的。而沈从文先生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一文中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时说：住家附近是前门外一条小街，那里的一百家古董店，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型人文博物馆，带他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相比之下，这样的生活对于今天的文化人而言，是有点陌生了。不仅旧书铺、古玩店这些旧时的人文风景在今天的大学周边完全消失，而且，对于今天的读书人而言，可能宁愿去嘈杂的餐馆、酒吧和各种聚会场所，也不愿去光顾瓷器店、博物馆和文物商店。今天的读书人的确是普遍不玩物了，但文化人的“志”是否比前人更坚定了昵？

2017年6月写于沪西寓所



汝窑水仙盆（故宫藏品）



乾隆咏瓷诗（故宫藏品）

“从农田到餐桌”中的善意

——由日剧《小森林》想到的

陈沐

佳”，此外还有延龄草，猪芽花，鹅掌草，白根葵，淫芋。

家养的蔬菜包括：生吃起来咔嚓咔嚓的水菜，在冬天也能长成莲花座的塔菜，仲夏也能长成的胭脂豆，虫子们也很喜欢的小松菜等等。此外，市子的家是被沼泽和森林还有田地包围着的一间小屋，因此，夏天的夜晚，造访者络绎不绝：浅蓝色大天蚕蛾，独角仙，萤火虫，还有来偷吃李子的熊。

秋天，有一幕是她在河边捡拾树上落下的核桃，忽然看到一只小松鼠在吃核桃，市子静静地望着它，一脸的喜悦与温柔。

最明显地表现出导演“教化”意图的情节，是村子里开会，一屋子老年人中，只有两三个年轻人。一位长者说：“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商量我们村东面斜坡休耕田的事情。那里的管理总是不到位，可能致使椿象虫侵袭周边农田，造成恶劣影响。我们接到农协以及农改普及所的多次反映，所以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份资料……我们村政府希望大家有效利用这块农田，增加自身收入，同时珍惜保护小森的农田以及美景。”男人们开会，女人们在准备着食物。市子的内心独白，描绘出日本农人的日常：“种植数十种蔬菜，谷物，并将其加工以便食用，做家务，养育子女，去山中或城里工作，为冬存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散会后，年轻而帅气的男子悠太对市子说：“休耕田那事，大爷大妈都上了年纪，看来我们得行动起来。”电影结尾，年轻人回到故乡，售卖旧时风味食品、跳起传统的舞蹈……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面临着乡村老龄化、空心化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奔向大城市。随之而来的，传统的农业生活以及饮食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人意识到这种变化扰乱了人们的身心平衡，于是他们从食物的角度进行反思，宣传“正食”观念。日本正食协会社长冈田恒周曾经在

我国做过关于正食的演讲。“正食”是日本明治时期一位陆军药剂官在自古代流传下来的食物养生物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一套体系，之后樱泽如一在此体系上又加入易学的概念使之成为“正食”，成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食物疗法。后来，这一理念传播到欧美，冠以“Macrobiotic”之名，意为“以生命这个整体为基点，在大自然的规律中充分发挥自我的一种生活艺术”。

这种饮食观念特别注重对环境的顺应和爱护。比如“身土不二”，意即“环境和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生命这一自然现象是由所处的环境而造成。居住地的土壤、正常节令生长的自然食物，是最适合自己的，因此应该尽量食用身边（国内生产）的食物。再比如，对食物应存感恩之心。“当下我们身处的时代物质充沛，日常所需所用随手可取。但是同时也存着环境被破坏，疾患在增加等负面影响。……食物从诞生，成长到收获，然后进入到每个家庭的餐桌上，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劳动力，可想而知浪费食物是多么的不应该。这也是我们教育下一代，宣传食育重要性的出发点。”

有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何一部以食物为主线的日剧会如此关注人与生态环境。

今天，人类的饮食生活越来越依赖工业化的生产，食物日益向“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向发展。从农田到餐桌的距离已经无限遥远，我们不知道眼前的一蔬一饭，是由何人种植、何时收割。我们对食物，没有情意，也没有疑虑，它们只是随时可以从超市购买的一种物品而已。在这样的时代，谁又有心情去精耕细作？

《小森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改善之路：让年轻人亲近农业，创造出更美好的食物与环境，也让身处其间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从务农经验到商业模式、情怀卖点，全剧几乎手把手地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步骤。当然，电影并没有



山境

（油画）

李诗文

《儒林外史》中的“南京风味”

江立

卖的都是这湖鱼”，这应是清代的情形。明代，玄武湖系板籍库藏重地，百姓不得随意出入。清代湖禁开，玄武湖成为南京商品鱼的主要产地。《金陵物产风土志》记载：沙洲南北二十“膏沃甲一郡……田多而近郭者，碾米入市，其聚处谓之行。皆在聚宝门外；或泊米船河下，不入行，行人经与量，日河解稻。”猪亦取自南乡。南京人用的柴，主要有两大来源：自西水关来者为洲柴，船运人沿河求售，至上浮桥而至。自南门来者有桤、栲、楮、橡、松毛。

《儒林外史》第24回称聚宝门每日运进来不止千牛万猪，“粮食更无其数”——此话虽有夸张，却表明南门对于南京民生的重要。第35回写玄武湖：“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

嫩，秋冬尤佳，俗称板鸭。其汁数十年，且有子孙收藏，以为恒业。……江宁特产也。”在《儒林外史》中，板鸭频繁出现在南京城的日常宴席中，几乎“无鸭不成席”。

鱼品则以鲥鱼为美。鲥鱼只产于长江下游，四月方出，产量少，“物以稀为贵”。《儒林外史》第44回里写庄濯江送杜少卿的端五节礼中有一尾鲥鱼、两只烧鸭，堪称地道的南京风味。

作为积淀着六朝之风雅的古都，南京这座城市迥异于其他城市的气质，还从饮茶的方式上有所体现。由于秦淮河水为染丝漂洗污染，旧时城内主要饮用井水和雨水。雨水含矿物质少，宜煮茶。平时茶馆和民户皆用大缸储存，《金陵物产风土志》里说：“判分昼夜，用过梅天，炭火粹之，叠换缸瓮，

因具有“教化意义”而牺牲美感和深度。即使单纯作为一部文艺片来看，也完全合格。

为了表现“归隐田园”的美好，导演煞费苦心。市子在城市里生活的那几年，生活非常压抑：住在狭小逼仄的公寓里；在超市上班，满怀情意地为男同事做午饭，却遭到对方的轻视。而描述乡村生活时，则天地山河，忽然都有了光。秋天，市子留着齐耳短发，戴着渔夫帽、身穿蓝色风衣，背后是层林尽染的山林，她站在树下，望着树上的果子，“稻叶渐渐变黄，养分注入稻穗，也慢慢滋养出甘甜。还是坚硬青绿的通草果也变成了胖乎乎的紫色，等到破口开裂就可以吃了。”

劳作的细节之中，亦不着痕迹地散落些世间智慧。市子采红豆时说，“发芽的时候如果天气太冷，需要日照的时候如果连日下雨，生长和天气如果配合得不好，就容易招虫或者生病，其它的作物也有各自的播种时期，也得配合当季山上的花和鸟的习性，这都是老一辈积累下来的经验呀。”一位长者答：“是呀，所有事情都得看好时机呀。”然后女主角便回想起令人遗憾的往昔……

市子母亲的角色，全部是以回忆以及书信的形式出现，伴随的是书面化、内省性的台词，这样的穿插平衡了全剧的烟火气，而且也使得故事的维度更丰富。母女之间的戏份，可以看作是人在不同阶段对亲情的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女人在不同年龄段的内心成长；还可以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与和解。

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总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回归田园。类似《小森林》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越来越多。一位叫滨斌的85后青年，在山间租下一间房、几亩地，把自己的耕读生活写成了一本《山居岁月》。

他和市子一样，只靠一群鸭子，一亩稻田一年就收获了七百多斤谷子。说起来，“以田养鸭，以鸭促稻”的方法在宋代已经有了。杨万里有一首《插秧歌》中提到，“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看鹅儿与雏鸭”。当时，农人已经在稻田中放养鹅鸭等家禽，这句话是强调在插秧的早期，秧根还没有长老的情况下，不要将鹅鸭放入稻田中。

还有一个巧合是，滨斌和市子都是独居的年轻农人。市子在兼职当搬运工时感叹，“赚钱也好，家务活也好，没有人替我分担。在这挣钱的时候，家务活还一样没干呢。除雪的时候柴也劈完了，哪有这种天大的好事！”而滨斌在书中也写道，在地里忙碌了一天，想到回家还要自己做饭，这时才体会到，生活还是需要一个搭伙过日子的伴。

在日本，夫妻双双归隐田园的风潮现在似乎很流行，生活类图书几乎被他们承包了：《耕食生活》《京都山居生活》《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这些书的中文版如此受欢迎，有些甚至还出了续集，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的归隐田园之风也在慢慢兴起？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